

新制度经济学

付泳 郭龙 李珂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F279.245/F831

新制度经济学

付泳 郭龙 李珂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制度经济学/付泳, 郭龙, 李珂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311-03080-3

I. 新... II. ①付... ②郭... ③李... III. 新制度经济学
IV. 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7526 号

策划编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张 雯 高燕平
封面设计 汤 萍

书 名 新制度经济学
作 者 付泳 郭龙 李珂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残联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080-3
定 价 2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

(代序)

在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之前,先谈谈我们心目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什么样的。人的经济活动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制度经济学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注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在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交易活动要付出成本,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特征。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那就是:交易费用概念加新古典经济学。用这种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已经应用到了许多领域。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是否可以在中国应用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老子有一句话,叫作“太上,不知有之”,如果我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很完善,运转得很有效,我们也不会感到要考虑制度问题。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制度结构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有研究制度的需要和热情;第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只有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制度才是重要的。而在我国,单位交易费用远高于许多其它国家,因此更有必要引进和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和探讨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观重新评价我国几千年的经济史。以往的历史观只注重用技术水平来评价我国经济史:认为几千年的中国,除了四大发明以外就是一片黑暗;我国近代以来的落伍是由于没有发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工业革命。只有用对制度的描述和分析,才能重新肯定我国在历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才有可能找出工业革命何以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制度原因。第二,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过程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

在世界中都是不多见的。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有幸处于这样一个亲临其境的位置上,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和解释,本身就具有世界文献价值。反过来,大量生动的制度变迁的事实,会进一步充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有可能将这一理论推向前进。第三,在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我们可以通过对技术进步何以缓慢,分工和专业化为何难以发展,大规模生产方式为何亦发展不快的分析,多方面地、更完善地构画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功能。第四,尽管制度经济学家强调对制度变迁过程保持敬意,但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竞争性制度设计。只要我们不把自己的制度设计看做是唯一应该接受的、排他的,而是当作可被政府、企业以至个人自由选择的备选方案,制度设计就有积极意义。在目前,我们可进行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1)对我国正在经历的制度变迁过程提供变迁形式或过渡形式的备选方案;(2)为解决与其它国家共同的外部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贩毒问题提供备选方案。第五,我们是中国人,也是世界经济学界的成员,因此不仅要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要为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们能在这一过程中超越现有理论,就等于把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新制度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来已经有 10 多年的时间了。作为一种理论,它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它的革命性的理论含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充满想象力的独特思路,甚至它的表达方法所包含的理论趣味,使得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中引起的震荡,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任何一种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在 1991 年科斯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文献也越来越多。在 1992 年和 1993 年,一年一度的上海三联书店主办的经济理论研讨会上,主要的论题就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的制度经济学各流派为理论背景的。我国主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自 1992 年 3 月起,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方法的论文。包括其它学术刊物的文献在内,中国经济学家已经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到过渡经济学、政治改革分析、国有企业性质与改革以及金融市场、公共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的

分量,比在它的发源地美国更重。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以至在全世界范围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它自身的理论价值。而所谓理论价值,是指对实际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和分析、解决人们所面对的经济问题的工具价值。20 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以及各个计划经济国家最终都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以及其它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走上市场化改革之路,雄辩地证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力量和预见力。第二,在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革过程中,新制度经济学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制度变革的理论。因为把制度看做是重要因素的经济学必然会把制度看做一个变量。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使我们很容易想到,制度变革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成功的改革应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改革的成本主要来自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当所引致的抵制和冲突,所以要寻求一种既要变革、又要维护各方利益的改革方式,就是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又能在科斯定理的基本逻辑中找到某些提示:无论产权的初始界定是怎样的,只要这一界定是明确的,如果人们愿意就这样的产权安排进行交易,资源配置必会得到改善。如果将计划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安排看成是产权的初始界定,对这样的利益安排进行自愿交易,就能在改善资源配置的同时,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实现市场化。最后,仅从纯理论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也是值得细品的。它的注重案例研究的特点,讲故事式的叙述风格,巧妙的模型设计,引人入胜的假说以及化繁为简的理论特征,都会使读者在追求工具价值之外获得一种理论美感的享受。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渴望新理论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扫除了大多数学术上的禁区,市场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他们的前辈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询的行列,向政府高层提供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机构势成竞争。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着人们对它的解释,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市场化的主要内容——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正在艰难中前进,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还在辩论之中。

经济学家们在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的理论资源。就在这时,新制度经济学与许多其它经济理论一起,进入了中国。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从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一年一度的经济学研讨会多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是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并开始了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强调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己任。从90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引起的兴奋开始消退,中国经济学界代之以低调但稳健地前进。

毫不奇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显然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有关。首先人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一个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则有效得多。在这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马上给予回答,因为它曾被用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那些对计划经济有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或者只是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而默认计划经济在生产关系上仍是优越的(如张闻天,1979);或者在集权和分权方面做文章(如布鲁斯,1984)。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它一般不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有趣的是,它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有时也能用来为计划经济提供依据。例如奥斯卡·兰格就曾证明,只要:(1)中央计划当局用试错的方法找出均衡价格;(2)企业经理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来决定产量;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论证显然忽略了中央计划当局本身也是个利益主体和企业经理的动力问题,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在各种理论的竞争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解释。针对列宁提出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的形象比喻,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企业内组织费用作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业组织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那一点上,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企业超出这一点继续扩张,以至扩张到了整个社会,显

然企业的组织费用会远远高于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自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在这时,进行市场化改革,即将企业的规模缩小到它与市场的均衡边界上,无疑会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产权,也似乎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国有产权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确的,但一个有效的产权还要能在现实中有有效地行使。并且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始终存在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作为这一冲突的解决方案也仍然要承受代理费用。国有企业将这一问题推向极端。事实上,我国20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用市场价格机制代替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指令;二是用非国有的产权制度替代国有的产权制度,或者是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外生长起来,或者是国有企业自身进行产权改革。

从更大的背景看,中国有着制度经济学成长的丰沃的土壤。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一般性;尽管我们也清楚,制度经济学也只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支,但如果认为制度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我们不仅覆盖了经济学的大部分视野,而且将对所有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持开放的态度。

具体而言,能够滋养制度经济学的中国资源包括:中国问题,中国文献和中国历史。所谓中国问题,不仅包括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也包括从中国角度提出的问题。比如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有着比道格拉斯·诺斯更为优越的条件,因为不仅可以从历史文献中了解制度变迁,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制度变迁;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我们正亲眼看着“猿变成人”。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也呈现出了一些原有理论所不曾想象的到的特征。如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已使人们怀疑“要么不改,要么全改”的次优理论,然而它的理论含义还需人们进一步探索。这一成功也同样使人们推测,交易也许是比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改革方式。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还等待着人们去挖掘。从更大范围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应包括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制度资源的重新理解,和这些资源如何与外来的制度资源结合起来,构成中

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谈到近代,不能不谈中西冲突,也不能不正视由于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的角度,会使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些问题,却被中国学者所重视。例如,假如没有自由迁徙的条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并非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坚信的那样,会带来全世界的皆大欢喜。再比如,在研究国际经济时,西方学者多是暗含地假定国际的政治秩序与一国之内无异,这大概与西方世界在这一秩序中占有优势有关;而中国学者可能会更敏感地意识到国际政治秩序中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也许才是制度经济学家应该全力面对的。

尽管有关制度经济学的中国的经济学文献还是很少的,但在一个较窄的领域中,还是相对丰富的,这就是有关中国式改革的过渡经济学的文献。除此之外,我们所指的中国文献是对制度有所描述的古典文献。数千年的历史,使重视人与人关系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积累的文浩如烟海。从中国最古老的《尚书》开始,就有了对制度的记载;号称“三礼”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做了大量描绘和评述;怪异的《山海经》被有些作者认为是上古政治制度的记录,《春秋公羊传》则是儒家政治制度经典;后人所编《十通》和《五礼通考》都是资料全备的制度史。更有数不清的政府档案和民间合约资料。当我们研究制度时,这些有关制度的资料极为重要。当科斯为了研究企业制度,用自己的诺贝尔奖资金建立了“匹兹堡大学契约和企业结构研究中心”时,他期待着这些企业合约资料能为研究者提供经验素材;张五常教授在酝酿他的《佃农理论》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来自南京的几张租佃合约帮了大忙。因为有关制度的理论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制度的评判,也要参照它的社会结果。而要发现其中的逻辑,不仅要有互动的广泛性,还要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国的有关制度的文献,对比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无疑要丰富得多。

谈到中国文献,中国历史文献也包含其中。而这里讲的中国历史,应是指中国历史相对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西历史发展轨迹在上古时期就有分野,明显的分道扬镳也许是在所谓第一轴心时期,即儒学和基督教诞生的时期。在以后,中国和西方走着大不相同的道路。不应否认,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是以西方经验和西方历史造就

的文化取向为基础的。这种文化取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西方经济学的性格,又被误认为具有普适的性质。例如,西方经济学多是假定经济活动是在较为“纯粹”的制度安排,如法律、市场、企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与西方社会不同制度安排间的对立和紧张不无关系。将人类历史划分成截然不同的几个阶段,也是西方历史阶段在这一理论中的反映。将中国历史考虑进来,不仅可以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重述中国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特征,会为这个一般理论注入新的因素。例如,“礼”可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受到关注,并可能冲击原有的制度概念;区别于对立且互补的希腊—希伯来传统结构,以儒学为主的浑然一体的制度结构可能启发人们关于制度结构特征的思考;中国将道德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传统,也许会为我们解决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秩序提供某种可行的方案。

当然,处于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中国学者不仅会受益于中国资源,而且他们必将把全世界的资源视为自己的资源。他们不仅同样关注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也将会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其它文明,如印度和伊斯兰的资源。善长数学的中国学者,如果再加上对制度的深刻理解,也有可能在用博弈论的方法构造制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与其他国籍的学者一起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它们包括:(1)制度变迁问题;(2)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包括外部性问题及其它市场失灵的问题;(3)全球的外部性问题,如全球环境、公海捕鱼、南极问题、太空问题等;(4)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即能否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问题;(5)政府的起源、性质和演进的问题;(6)道德与宗教问题,即这些无形制度的起源、性质和演进,以及与有形制度间的互动问题;(7)将智力活动纳入产权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制度创新,以及这种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8)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融合和整合的问题。

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是金融资源和学术机制。由于缺少金融支持,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相当零落。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论文,多是发表出来就没有下文了。而理论的发展,如同美国制度经济学那样,正是一篇论文才激起了别人的灵感,通过相继的讨论甚至争论,以及进一步的发挥,最终形成了有阵容的理论学派。而在中国,不少有潜力的学者却因

为生计问题分散精力,从而缺少对重要问题的持续攻关。从学术组织角度看,虽然制度经济学在中国风靡一时,但还缺少有资金实力的研究机构支持系统的研究。也许,制度经济学家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制度问题,包括融资制度、学术组织、研究纲领和分配机制。随着中国在经济上走向繁荣,当有更多的资源通过有效的机制注入到研究中来,我们也许会迎来一个中国制度经济学与中华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作者

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

目 录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代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历程·····	(1)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	(9)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及基本假设 ·····	(18)
第四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与框架内容·····	(30)
第二章 制度与制度均衡·····	(35)
第一节 制度的内涵与构成·····	(35)
第二节 制度的起源与功能·····	(53)
第三节 制度均衡与制度非均衡·····	(71)
第三章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79)
第一节 制度变迁的内涵及原因·····	(79)
第二节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学习机制·····	(84)
第三节 制度变迁理论假说与模型比较·····	(97)
第四节 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111)
第四章 交易费用理论·····	(123)
第一节 交易费用理论的渊源和基础·····	(123)
第二节 交易费用的基本内容·····	(128)
第三节 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与发展·····	(143)
第五章 产权理论·····	(148)
第一节 产权理论的渊源和发展·····	(148)
第二节 产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152)
第三节 外部性与科斯定理的相关定理·····	(160)
第四节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	(167)
第六章 企业的性质理论·····	(176)

第一节	企业性质的理论解释·····	(176)
第二节	企业的发展及企业制度的演进·····	(186)
第三节	契约的不完全性与契约实施机制·····	(191)
第四节	企业代理问题与激励契约设计·····	(205)
第五节	企业所有权的最优结构·····	(218)
第七章	人力资本与企业治理演变·····	(227)
第一节	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与特征·····	(227)
第二节	人力资本与企业所有权安排·····	(244)
第三节	人力资本与企业治理演变·····	(259)
第八章	公共选择理论·····	(270)
第一节	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270)
第二节	直接民主制经济理论·····	(282)
第三节	代议民主制经济理论·····	(300)
第九章	公共物品理论·····	(321)
第一节	灯塔与公共物品·····	(321)
第二节	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准则与条件·····	(328)
第三节	公共物品低效提供原因及模型分析·····	(332)
第四节	公共物品的提供决策机制·····	(336)
第十章	国家理论·····	(353)
第一节	国家的定义和起源·····	(353)
第二节	国家模型·····	(368)
第三节	“诺斯悖论”·····	(371)
第四节	国家理论的应用·····	(376)
第十一章	新经济史·····	(382)
第一节	新经济学史学概述·····	(382)
第二节	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	(388)
第三节	“李约瑟之谜”的破解·····	(397)
第四节	新经济史对经济发展史的重新解读·····	(401)
主要参考文献	·····	(409)
后记	·····	(421)

第一章 导 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经济学最为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和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先后于 1991 年和 1993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说明了新制度经济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西方,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完整体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制度并检查它的结果,21 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它将对越来越多的引导经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显然,深入学习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本章首先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然后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接着阐释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及基本假设,最后论述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与框架内容。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历程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是长期的理论积累过程。新制度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衰落,自由主义思潮流行的时代兴起的。20 世纪 60—70 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滞胀问题,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传起来,他们赞扬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主张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经济的均衡,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一些国家取得统治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就在这时候兴起,它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需要,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而且最有助于使西方传统经济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理论。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他成功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某些经济现象的分析来阐述隐含在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运行规则和制度基础。一般来说,科斯在1937年撰写的经济学论文《企业的性质》被公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这篇论文中,科斯揭示了促成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基本概念——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无疑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石。随着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1960年科斯发表了另一篇经典性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在该论文中,科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外部效应问题,正面论述了产权的经济作用,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后来他的观点被概括为“科斯定理”,^①构成了产权理论的一个逻辑起点,并成为推动新制度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原动力。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将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用于许多领域,如代理关系、寻租活动、外部性问题、纯粹市场与科层组织结构之间的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形态、经济史等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性的研究,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也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显学”。

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学者;罗纳德·科斯,他使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交易费用的各种后果,他把交易费用及产权引入到经济分析之中,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经济的解释力;詹姆斯·布坎南及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经济史学家,如道格拉斯·诺斯,他通过分析以往的经济发展发现了制度的重要性;还有像威廉·维克里那样的经济学家,他揭示了人具有有限而非对称信息的后果。这些作者分别在1974年(哈耶克)、1986年(布坎南)、1991年(科斯)、1994年(维克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实说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②

① “科斯定理”是由斯蒂格勒于1966年在其《价格理论》一书中首先命名的。

②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页。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并被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回顾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必须将视角推向历史的纵深。

(一)制度主义的先驱

制度经济学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包括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① 他们揭示出了运行中的经济,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化的性质。而涂尔干和孔德的社会学传统也是制度研究的重要起源。^② 特别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通则》中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制度发生和制度职能的科学,并给出了制度学的研究方法。孔德则保持了与经济学的密切联系,并通过英格拉姆等英国历史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理查德·琼斯在 1833 年的一篇演讲,被霍奇森认为是制度主义方法论的源头。琼斯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一般假设集合出发,推导出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原理,他们就是自欺欺人,而以这种方式得出的一般原理也缺乏一般性。因此,经济学家不应通过抽象和演绎获得结论,他们必须“看和观察”(Look and See),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最广泛的历史和统计研究上。

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始于德国历史学派。老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反对将经济学作为狭隘定义和抽象演绎的政治经济学,而应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法理学紧密联系,但其原理并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时期和地点。作为青年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施莫勒用历史和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处理各种主题,拒绝推理的作用,仅仅坚持在无限的历史变动中的客观和记录下来的东西。熊彼特将施莫勒视为美国制度主义之父。由于无法

①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39~40 页。

② 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一个面向管理时代的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00~201 页。

③ 埃克伦德,赫伯特:《经济理论与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43~344 页。

提供指导和限制人类活动的原理,历史主义是一口无源之井。^① 尽管与德国历史学派存在方法论上的著名争论,但在对制度研究的推动方面,奥地利学派功不可没。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在于将制度的分析置于人类的有限知识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语境。奥地利学派将经济视为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强调发生于历史性时间里和不确定环境中的无止境的试错过程。制度因素在奥地利范式中是至关重要的。

在科尔奈对制度范式进行的简单历史回顾中,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和最有力的批评家,马克思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马克思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领域),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考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察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观点。^② 诺斯也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③ 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产权理论,为更好地理解经济过程做出了贡献。^④

柯武刚和史漫飞将弗赖堡学派也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先驱之一。^⑤ 弗赖堡学派的构造性原则包括私人产权、缔约自由、个人对其承诺和行动负责、开放的市场、稳定的货币和经济政策,这些原则应当以同样的程度应用于所有相互依赖的市场,从而保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二)老制度主义

卢瑟福将老制度主义传统分为两个主要的研究纲领。^⑥ 第一个纲

① 埃克伦德,赫伯特:《经济理论与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② 科尔奈:《制度范式》,载于《比较》,吴敬琏主编,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③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8页。

④ 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⑤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3页。

⑥ 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